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中国现代化历程
(第二卷)

虞和平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 国 文 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中国现代化历程

(第二卷)

启动与抉择

主 编 虞和平

副主编 马 勇 苏少之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二卷撰稿人

虞和平：卷首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十五章

虞和平、林建曾：第二十章

马 勇：第五章 第十一章 第十三章
第十八章 第二十一章

史建云：第八章

周洪宇、左玉河：第九章

王海林、周 军：第十章

周 军：第十二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四章

钱 江：第十四章

高 军：第十五章

杜恂诚：第十六章

卜国群：第十七章

汪朝光：第二十三章

目 录

卷首语	361
第一编 现代化的启动与异化(1912—1916)	
第一章 民国成立与现代化因素整合	373
第一节 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建立	373
第二节 权力结构的多元化	377
第三节 政府的现代化建设规划	381
第四节 军阀官僚的振兴实业活动	388
第二章 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	396
第一节 经济团体的兴起	396
第二节 社会动员	402
第三节 目标认同	407
第四节 组织和作用的异化	412
第三章 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初步形成	415
第一节 经济法制体系的建立	415
第二节 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化	422
第三节 成败参半的执行状况	427
第四章 资产阶级的形成	436
第一节 何谓“阶级形成”	436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自在”状态	439
第三节 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	443
第四节 资产阶级初步“自为”化	447
第五章 现代化的危机:体制问题	454
第一节 现代化对民主政治的诉求	454
第二节 权力危机的出现	458
第三节 宪法体制的破坏	463
第四节 洪宪帝制:对政治现代化的挑战	467
第二编 自由发展与道路选择(1917—1927)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473
第一节 工商业蓬勃兴起	473
第二节 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480
第三节 “黄金时代”的发展特点	485
第四节 “黄金时代”的衰落	491
第七章 传统农业的初步改造.....	498
第一节 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499
第二节 农业改造中的制度因素	500
第三节 农业改造中的技术手段	505
第四节 农业教育体制的改革	512
第五节 资本主义化农业的推广	515
第八章 手工业的现代化趋向.....	525
第一节 商品化生产扩大	525
第二节 生产技术革新	536
第三节 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化	540
第四节 工场手工业发展	546
第九章 现代教育事业的崛起.....	552
第一节 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	552

第二节	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兴盛	558
第三节	洋为中用：教会学校中国化	566
第十章	社会主义传入：发展道路的新选择	572
第一节	学习西方成迷梦	572
第二节	空想社会主义	576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580
第四节	问题与主义	585
第五节	怎样推动工业化	590
第六节	走俄国人的路	596
第十一章	五四时期的现代化理念	600
第一节	“全盘反传统”	600
第二节	新传统主义	607
第三节	中西融合：一个理论难题	611
第四节	中国本位与东西互补	615
第十二章	早期共产党人的寻求	626
第一节	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	626
第二节	民主革命：道路选择的前提	630
第三节	三种方案：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638
第十三章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	646
第一节	北洋政府的权力危机	647
第二节	“桃花源”：湖南自治的理想与实践	649
第三节	联省自治：虚置政府	655
第四节	同一理由的不同主张	661
第五节	梦幻破灭	669
第十四章	南通模式：区域现代化的尝试	671
第一节	经营乡里：中国士人的一种选择	672
第二节	实业为自治之本	675
第三节	教育为实业之母	679

第四节	慈善为养民之道	682
第五节	成败缘由	686
第三编 崎形发展与道路分野(1928—1936)		
第十五章	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建立	693
第一节	集权政治的理论来源	694
第二节	专制主义的行政体制	700
第三节	集权主义的经济秩序	705
第十六章	工业化中的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	708
第一节	政策调整及税制改革	708
第二节	国家集中建设重工业	711
第三节	国家资本开始垄断金融业	714
第四节	民营经济的资本集中	717
第五节	工业化的结构转变	728
第十七章	政府试图拯救农业	732
第一节	“平均地权”的理论探讨和立法	733
第二节	“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受阻	736
第三节	“合作社”：“温和的土地革命”	740
第四节	和平土改：合作运动的目的	746
第五节	合作运动乏善可陈	750
第十八章	民间致力农村复兴	755
第一节	乡村建设	756
第二节	乡村都市化	759
第三节	并不成功的实践	765
第十九章	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实践	771
第一节	根据地：特殊的实践环境	771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	775
第三节	人民民主政治体制萌生	783

第四编 外患内乱与道路抉择(1937—1949)

第二十章 抗战时期的西部工业化.....	793
第一节 沦陷区经济严重萎缩.....	794
第二节 工业建设重心西移.....	798
第三节 西部工业化的资金传动.....	803
第四节 西部工业化的科技传动.....	807
第五节 西部工业化市场传动.....	811
第六节 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	814
第二十一章 现代化道路之争.....	821
第一节 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动员.....	821
第二节 民主与专制理论的分野.....	828
第三节 真假三民主义之争.....	836
第二十二章 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构想.....	845
第一节 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	845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的道路选择.....	850
第三节 阻力和动力的阶级分析.....	854
第四节 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方向.....	860
第二十三章 振兴实业“一线生机”的破灭.....	872
第一节 “经济重建”彻底“崩盘”.....	872
第二节 “农业复兴”变成“农村破产”.....	879
第三节 国家资本成了“豪门经济”.....	884
第四节 通货膨胀导致天怒人怨.....	890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抉择.....	896
第一节 共产党社会动员策略的成功.....	896
第二节 社会力量结构的大调整.....	905
第三节 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终结.....	910
第二十五章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概况.....	913

卷 首 语

在清末的 70 年中,中国的政府和民众虽然进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尝试,使中国的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产生了一些现代性的社会因素,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只是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启动准备了一些前提条件。19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才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启动阶段,并经历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从初步发展到穷途末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探索到认同的过程,完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抉择,终于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有关理论认为,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就是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运作下,全面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启动阶段中,政权已掌握在希望发展现代经济的集团的手中,社会制度变革的要求和实践更加剧烈,作为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社会资金有了一定的积累,工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开始从主要是农村的农业生活方式向主要是城市的工业生活方式转变。这也是各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共同规律。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虽然政治上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因素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社会政治因素来说,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政权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权象征的中华民国诞生了,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的

新式政府机构设置起来了,而且由此永远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时代,追求民主、共和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民国成立之初,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大声疾呼:“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1]继而登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也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2]从中央政府的工商部到各省府的实业厅相继制订《实业计划》,召开工商会议,研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办法。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便召集工商界举行全国经济会议,部署整顿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政府的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法规,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逐步形成。

从社会制度变革因素来说,要求改革有害制度的潮流渐趋高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因素开始从清末的局部产生和萌芽阶段进入到推广和成长阶段。政治制度的改革,政府方面的举措固然有名无实,社会方面的变革则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而不断高涨,使民主进步的力量日益壮大,不断冲击着有碍于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制度,帮助国民党消灭了军阀割据势力,实现了全国政权的基本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而且建立了民主革命根据地,显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新方向。经济制度的改革,除了抗日战争和战后的特殊时期之外,随着一系列经济法规的制定,民营经济获得了一定的法定地位;企业有了一定的现代企业规范,不仅成为法定制度,而且基本臻于完善,并被要求应用到一切相关企业。教育制度在教育界的推动之下有了较为广泛的改革创新,使新式教育、高等教育、专门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技制度的改革,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逐渐受到重视,颁布了一些鼓励技术发明和推广应用的政策和措

[1] 1912年4月18日《民主报》。

[2] 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3页,上海广益书局,1920年版。

施,建立了一些新式的研究、试验和推广机构,并开始进入国际科技界。

从资产阶级的成长因素来说,其自身已基本形成为一支现代化建设的主干队伍。中华民国一成立就出现了工商界组建团体的高潮,尤其是商会组织,不仅进一步普及化和规范化,而且建立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此后,工商团体的种类和数量虽有所减少,但组织程度更加趋于成熟,全国性的团体有增无减,它们所进行的为改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环境的内政、外交、经济和文化活动,不仅持之不懈,而且从被动参与进展到主动发起。各种资产阶级团体的发展和从事改良活动,既说明资产阶级在多层次和多方面实现了整合,使他们的组织形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也标志着他们已经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基本自为的阶级,从而使他们承担现代化历史使命的层面,逐渐从诸多分散的个体转向集体,从地区转向全国。

从社会经济因素来说,资本积累的来源和规模有所扩大,资本主义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一是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其在华开办企业的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张,而且向中国政府和企业提供实业贷款的间接投资也日益增加。二是随着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发展,国家的关税收入和买办的佣金收入明显增加,其中的一部分通过政府投资和买办个人投资而转化为资本。三是官僚、军阀私人投资企业活动更加普遍化,他们把利用权力搜刮来的大量资金转化为资本。四是银行业和证券业有较快发展,使借贷资本的来源和规模更加广泛化和社会化。五是华侨回国投资出现高潮,成为海外资本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六是民间的投资创办企业活动趋向活跃,把更多的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七是资本积累出现了飞跃,规模较大的资本集团开始产生和发展。八是随着对科技的重视和推广应用,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管理和生产中科技水平逐步提高,有的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农业生产也开始提倡和采用新式科技。九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工矿交通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体因素，并带动农业和传统手工业生产中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现代化的因素开始出现。十是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人口明显增加，城市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功能逐渐形成，城市生活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并部分地影响到农村的生活方式。其中前三项因素固然成为外国侵华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膨胀的温床，使工业化的健康发展受到不利影响，但是从这一阶段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整体角度来说，也具有程度不同的有利方面。

上述这些说明，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即争取国家独立，下同）的思想已渐入人心，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已经开始，制度机制和社会内部的有利于资本现代化发展的各项条件初步具备，并逐渐发展。由此而言，以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启动阶段的条件。

以上只是就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而言的，当然还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在国际环境方面，尽管争取国家独立和平等互利国际关系的社会力量在不断成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然而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国内政治环境方面，虽然要求民主和平的力量和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在不断扩大，但是专制独裁政权仍然存在，国内战争连绵不断。在资产阶级方面，他们虽然已基本形成为一支现代化建设的主干队伍，但是他们的经济力量仍然比较薄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没有改变，没有真正掌握现代化的主宰权。在经济因素方面，资本积累的增加不足以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结构状态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日趋畸形，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间资本（或称民族资本，下同）受到严重压抑；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技术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

程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低。这些不利因素使现代化的建设受到严重的制约和干扰，使各种有利条件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造成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极其缓慢。

上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的互相作用，使这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启动作用的发挥和异化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1912年，结束于袁世凯政府垮台的1916年。其所以把中华民国的成立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入启动阶段的开端，主要是从政治制度的变革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作用而言的，因为现代化的启动因素不可能在民国成立的一夜之间发生明显变化。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社会各界多认为政治革命已经完成，“民权主义”已经实现，此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民生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振兴实业”的高潮。不久，民国政权很快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者手中转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之手。袁世凯虽然为收揽民心、稳定局势，在经济上延续了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做法，但在政治上逐步实行专制统治，使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开始名存实亡，原先被认为已经解决的“民权”问题又重新成为一个问题，并日益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一变化，造成要求发展现代化的社会各界对民国制度和政权的现代化逐渐由满怀信心转向失望。

第二，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自由发展和道路选择时期。这一时期也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1917至1927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立即分裂，各自割据一方，中央政府丧失了统治全国的能力，军阀混战连续不断，使政府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无所作为。与此同时，政府也自我削弱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使得各种希望中国进步、发展的社会力量得以兴起，各自开展现代化建设活动，从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

体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既较少受政府的控制和干预，也得不到政府的扶植和领导，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由发展状态，并产生了两大新的气象。一是在社会、经济上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较快的成长；二是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主要标志的思想启蒙的新时代，并带动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探索和选择。

第三，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社会、经济畸形发展与道路分野时期。这一时期是指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28至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地方军阀势力被基本统一到中央政府之下，中央政权明显增强，并陆续制定了统一发展社会经济的计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不断增加政府投资，发展国营经济和各种官办事业，使之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政府过分扩张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而且以压迫和掠夺民间资本为代价；不断加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控制，使得社会力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压抑和阻碍，从而把资本主义现代化逐步拖入畸形发展的歧途，同时也激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特别是国民政府实行专制统治，残酷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国共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的力量在斗争中逐渐壮大，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期实践——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从而使以国民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分野日趋明显。

第四，外患内乱的加剧与道路抉择时期。这一时期即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国民政府垮台的1937至1949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疯狂的侵华战争，中国遭受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现代化的已有资源和成就受到巨大损失，以往的发展途径被中断，国民政府又以抗战为由肆意扩展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抗战结束以

后，国民政府不顾民族和人民的严重创伤，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接收日本在华资产之机再次大肆扩张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接着又发动全面内战，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由此，国民政府既给自身造成了政治和财政危机，也使社会经济的衰败和民众生活的困苦达于极点，日益失去民心，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入了穷途末路。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壮大，面临民族存亡的空前灾难，进一步思考救国图强的道路，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战后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并且通过坚决抗日、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倡和平民主、扩大统一战线、团结民主人士等主张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动员作用。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使得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得到日益广泛的社会认同，终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完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后抉择。

综观上述四个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分离和对立。由于对现代化启动本意的背离，致使政府和民众很少能在现代化建设中携手合作。在政府方面，虽然为巩固、加强其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在革命运动的推动和社会各界的要求下采取了一些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政策措施，但是其主要力量或用于维持统治地位，或用于镇压革命，或用于排斥异己和进行军阀混战，或用于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对民众的现代化要求和建设事业，不仅很少给予实质性的扶植，而且加以欺压、阻挠，甚至排挤、吞并。因此，政府在实质上丧失或异化了对现代化的领导作用。在民众方面，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愈加反感，但是也没有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在得不到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扶植下，只得自谋出路，或谋求“实业救国”，或谋求“教育救国”，或谋求“科学救国”，或谋求“革命救国”，凭借自己的努力进行有限的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政府力量与

社会力量基本处于分离和对立的状态：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分离，此时是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自由展开、初步发展，社会各界纷纷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阶段。直到北伐战争兴起，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趋于激化。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既合作又对立，此时是以政府力量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畸形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分野日趋明显的阶段。
第二，多种多样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模式。由于民国时期始终没有建立能够真正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也没有形成举国一致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建设力量，因而始终存在着与中央政权及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完全对立或相对独立的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政权、各种地方割据政权、地方实力派和各种社会力量。这些政治和社会派别，从各自的不同目的出发，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不同方法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其种类主要有：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军阀割据势力的“保境安民”的现代化模式，地方实力派的“地方自治”的现代化模式，社会力量的“乡村建设”的现代化模式。除了第二种模式另当别论之外，其余都对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现代化具有道路探索和社会动员的积极意义。第一种模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期实验，显示了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第三种模式，以张謇所推行的“南通模式”最为典型，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地方优势，推进了地方的现代化建设。第四种模式，以晏阳初、梁漱溟所推行的乡村建设模式为代表，它探索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途径，宣传了农村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初步培育了农村的现代化意识。第二种模式主要有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模式、阎锡山的山西模式、陈济棠的广东模式等，它们虽然具有较多的消极因素，如以维护地方割据政权和聚敛